



陕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

「明」呂柟 著

劉學智 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

「明」呂柟著 劉學智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明]呂柟著;劉學智點校
整理.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2014. 12
(關學文庫/劉學智, 方光華主編)
ISBN 978-7-5604-3557-2

I. ①呂… II. ①呂…②劉… III. ①呂柟(1479 ~
1542)—理學—文集 IV. ①B248.99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313466號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明代關學重要文獻研究”(項目號04B2X025)

出品人 徐 曄 馬 來
篆 刻 路毓賢
出版統籌 張 萍 何惠昂

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 [明]呂柟著 劉學智點校整理

責任編輯 馬 平 裝幀設計 澤 海
版式統籌 李玉皓
出版發行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號 郵 編 710069
網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電 話 029-88303593 88302590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裝 陝西博文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張 34.75
字 數 53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604-3557-2
定 價 122.00圓

《關學文庫》組織工作委員會

主 任 趙正永

副 主 任 江澤林 王莉霞 張豈之 陳國強 張祖培

執行副主任 徐 曄

委 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上官吉慶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華 江澤林 李 浩 李明遠 岳 亮

姜 鋒 馬 來 桂維民 徐 曄 陸柯倫

陳國強 郭大爲 郭立宏 張小寧 張社年

張祖培 張豈之 彭樹智 董 軍 趙正永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閻曉宏 權 儉

《關學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張豈之

副 主 任 趙馥潔 薛保勤

執行副主任 徐 曄 馬 來

總 主 編 劉學智 方光華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美鳳 方光華 米文科 李似珍 李穎科

何惠昂 林樂昌 郝潤華 袁志偉 馬 來

徐 曄 高彥平 郭文鎬 陳戰峰 孫學功

曹樹明 許 寧 張 波 張 萍 張 雄

張世民 張豈之 楊建輝 路毓賢 趙瑞民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韓 星 魏 冬



明萬曆孫祖訓匯編的《明狀元考》中的呂枏讀書圖像

總序

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宋鳳翔府郿縣（今陝西眉縣）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張載出身於官宦之家。祖父張復在宋真宗時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死後贈司空。父親張迪在宋仁宗時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張迪死後，張載與全家遂僑居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講學，世稱橫渠先生。他的學術思想在學術史上被稱為橫渠之學，他所代表的學派被後人稱為「關學」。張載與程顥、程頤同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可以說，關學是由張載創立并於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的地域性理學學派，亦稱關中理學。

關學基本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中國思想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舉措。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和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開拓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於北宋、下迄於清末民初，綿延八百餘年的關中理學的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於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關學文庫即將出版發行之際，我僅就關學、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關學的思想特質、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等談幾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一、作為理學重要構成部分的關學

衆所周知，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與新階段，一般被稱為新儒學。但在新儒學中，構成較為複雜。比較典型的則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南宋學者呂本中較早提到「關學」這一概念。南宋朱熹、呂祖謙編選的近思錄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學發展的統緒，關學是作為理學的重要一支來作介紹的。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

「濂學」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並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禕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概括為「濂洛關閩」四大派別，其中雖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及其影響並不限於某個地域，而成爲中華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即宋代理學。

根據洛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以及閩學代表人物朱熹對記載關學思想的理解、評價和吸收，張載創始的關學本質上當是理學，而且是影響全國的思想文化學派。過去，我們在編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學史上冊的時候，在關學學術旨歸和歷史作用上曾作過探討，但是也不能不顧及古代學術史考鏡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張載後學，如藍田呂氏等，在張載去世後多歸二程門下，如果拘泥門戶之見，似乎張載關學發展有所中斷，但學術思想的傳承往往較學者的理解和判斷複雜得多。關學，如同其他學術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源遠流長、不斷推陳出新的形態。關學沒有中斷過，它不斷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明清時期，關學的學術基本是朱子學、陽明學的傳人及與張載關學的融會過程。因此，由宋至清的關學，實際是中國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動態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概念，它開啟了清初王船山學術的先河。

關學文庫所遴選的作品與人物，結合學術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關學編及關學續編、關學宗傳等，均是關中理學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張載，下至晚清的劉光黃、民國時期的牛兆濂，能夠反映關中理學的發展源流及其學術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與歷史上的關中叢書相比，這套文庫更加豐富醇純，是對前賢整理文獻思想與實踐的進一步繼承與發展，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二、張載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

佛教傳人中土後，有所謂「三教合一」說，主張儒、道、釋融合滲透，或稱三教「會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並舉的文化現象。當歷史演進到北宋時期，由於書院建立，學術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場所，從而促進了學人的獨立思考，使

他們對儒家經學箋注主義提出了懷疑，呼喚新思想的出現，於是理學應時而生。理學主體是儒學，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將它們融合為一個整體，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從理學產生時起，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學學派。比如，在「三教融合」過程中，如何理解「氣」與「理」（理的問題是迴避不開的，華嚴宗的「事理說」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響）的關係？理學如何捍衛儒學早期關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觀點，又不致只在「善」與「惡」的對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與社會及個人有何關係？君子、士大夫怎麼做才能維護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又能堅持修齊治平的準則？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中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可能一開始就有一個統一的想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加以解決。宋代理學的產生及不同學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發展歷史的寫照，因而理學在實質上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時朱熹閩學各有自己的特色。作為理學的創建者之一，張載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抱負，在對儒學學說進行傳承發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北宋時期，學者們重視對易的研究。易富於哲理性，他通過對易的解說，闡述對宇宙和人生的見解，積極發揮四書義理，並融合佛、道，將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張載與洛學的代表人物程顥、程頤等人曾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學術思想上相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宋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張載來到京師汴京，講授易學，曾與程顥一起終日切磋學術，探討學問（參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張載是二程之父程昞的表弟，為二程表叔，二程對張載的人品和學術非常敬重。通過與二程的切磋與交流，張載對自成一家人之言的學術思想充滿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因為張載與程顥、程頤之間為親屬關係，在學術上有密切的交往，關學後傳不拘門戶，如呂氏三兄弟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師道、游師雄、潘拯、李復、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在張載去世後一些人投到二程門下，繼續研究學術，也因此關學的學術地位在學術史上常常有意無意地受到貶低甚至質疑（包括程門弟子的貶低和質疑）。

事實上，在理學發展史上，張載以其關學卓然成家，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理論建樹，這是不能否定的。反過來，張載的一些觀點和思想也影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對後來的程朱學說及閩學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張載依據易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在基本點上和易的原有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虛即氣」的觀點，認為沒有超越「氣」之上的「太極」或「理」世界，換言之，「氣」不是被人創造出的產物。又由此推論出天下萬物由「氣」聚而成；物毀氣散，復歸於虛空（或「太虛」）。在氣聚、氣散即物成物毀的運行過程中，才顯示出事物的條理性。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這個觀點去看萬物的成毀。這些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張載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間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處於宇宙之中。由於三者都是氣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歸根到底，萬物與人類的本性是一致的。進而認為，人們「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鰥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這裏所表述的是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與張載有別，他們通過對張載氣本論的取捨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關思想，建構了「萬理歸於一理」的理論體系。在人性論方面，二程在張載人性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論。二程贊同張載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二程認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瑕的；「氣質之性」是氣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氣稟決定，稟清氣則為善，稟濁氣則為惡，正因為氣質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氣」的侵蝕而出現「氣之偏」，因而具有惡的因素。在二程看來，善與惡的對立，實際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

朱熹將張載氣本論進行改造，把有關「氣」的學說納入他的天理論體系中。朱熹接受「氣」生萬物的思想，但與張載的氣本論不同，朱熹不再將「理」看成是「氣」的屬性，而是「氣」的本原。天理與萬事萬物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朱熹關於「理

一分殊」的理論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說：「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朱子語類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論包括一理攝萬理與萬理歸一理兩個方面，這與張載思想有別。

總之，宋明理學反映出儒、道、釋三者融合所達到的理論高度。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於兩宋時期。張載開創的關學爲此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子正蒙注序論）船山之學繼承發揚了張載學說，又有新的創造。

三、關學的特色

關學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這可以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學風篤實，注重踐履。黃宗羲指出：「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明儒學案師說）躬行禮教，學風樸質是關學的顯著特徵。受張載的影響，其弟子藍田「三呂」也「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特別是呂大臨。明代呂柟其行亦「一準之以禮」（關學編）。即使清代的關學學者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依然守禮不輟。

其次，崇尚氣節，敦善厚行。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張載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毅然辭官，回歸鄉里，教授弟子。明代楊爵、呂柟、馮從吾等均敢於仗義執言，即使觸犯龍顏，被判入獄，依舊不改初衷，體現了大義凜然的獨立人格和卓異的精神風貌。清代關學大儒李顥，在皇權面前錚錚鐵骨，操志高潔。這些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

最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關學學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張載善於吸收新的自然科學成果，

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他注意對物理、氣象、生物等自然現象做客觀的觀察和合理的解釋，具有科學精神。後世關學學者韓邦奇、王徵等都重視自然科學。三原學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經典，強調用心求學，求其「放心」，用心考證，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獨立主見的治國理政觀念。關學學者堅持傳統，但並不拘泥傳統，能夠因時而化，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由張載到「三呂」、呂柟、馮從吾、李顥等，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得到不斷承傳和弘揚。

四、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

關學文獻遺存豐厚，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涇野先生五經說、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於陝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或民間，其中有的在大陸已成孤本（如韓邦奇的禹貢詳略、李因篤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殘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殘本，現重慶圖書館存有原書，國家圖書館僅存膠片），收入的南大吉詩文，搜自西北大學圖書館藏周雅續）。即使晚近的劉光蕓、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傳亦稀世罕見。民國時期曾有宋聯奎主持編纂關中叢書（邵力子題書名），但該叢書所收書籍涉及關中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內容駁雜，基本上不能算作是關學學術視野的文獻整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將張載集、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關學編（附續編）、涇野子內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學叢書陸續出版，這些僅是關學文獻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統梳理關學學術文獻仍系空白。

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後，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掘。

現在將要出版的關學文庫由兩部分內容組成，共四十種，四十七冊，約二千三百餘萬字。

一是文獻整理類，即對關學史上重要文獻進行搜集、搶救和整理（標點、校勘），其中涉及關學重要學人二十九人，編

訂文獻二十六部。這些文獻分別是：張子全書、藍田呂氏集、李復集、元代關學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張舜典集、馬理

集、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呂柟集、涇野子內篇、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韓邦奇集、南大吉集、楊爵集、馮從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顥集、李柏集、李因篤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賀瑞麟集、劉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關學史文獻輯校。

二是學術研究類，其中一些以「評傳」或年譜的形式，對關學重要學人進行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郿縣張載、藍田呂大臨、高陵呂柟、長安馮從吾、朝邑韓邦奇、藍屋李顥、郿縣李柏、富平李因篤、郿縣王心敬、咸陽劉光蕡等學人，共十一部。它們分別是：張載思想研究、張載年譜、呂大臨評傳、呂柟評傳、韓邦奇評傳、馮從吾評傳、李顥評傳、李柏評傳、李因篤評傳、王心敬評傳、劉光蕡評傳等。此外，針對關學的主要理論問題與思想學術演變歷程進行研究，共三部。這些著作分別是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

在這兩部分內容中，文獻整理是文庫的重點內容和主體部分。

關學文庫係「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大力支持。文庫的組織、編輯、審定和出版工作在組織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日常工作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負責。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對這一功在當代、惠及後世的國家和省級重大文化精品圖書高度重視，親自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自始至終關心支持文庫的編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江澤林、副省長 王莉霞和省政府秘書長 陳國強等對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給予悉心指導；原陝西省新聞出版局局長 薛保勤、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 趙馥潔、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主任張祖培對文庫的策劃與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庫歷時五年編撰完成，凝結著全體參與者的智慧和心血。總主編劉學智、方光華教授，項目總負責徐曄、馬來同志統籌全書，精心組織，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協力攻關，精益求精，體現出深沉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責任感；他們孜孜矻矻，持之以恆，任勞任怨，樂於奉獻，以古人為己之學相互勉勵，在整理研

究古代文獻的同時，不斷錘煉學識，砥礪德行，努力追求樸實的學風和嚴謹的學術品格。出版社組織專業編輯、外審專家通力合作，希望盡最大可能提高該文庫的學術品質。作為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我謹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時間緊迫、經驗不足等原因，文庫書稿中的疏漏差錯難以完全避免。希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使用時加以批評指正，以便日後進一步修訂，努力使該文庫更加完善。

張豈之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呂枏，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生於明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卒於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弘治辛酉（一五〇一）舉於鄉。一生仕途坎坷，曾有三起落落。正德三年（一五〇八），時年二十九歲的呂枏，舉南宮第六人，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然而，時值閹黨劉瑾把持朝政，正直之士不爲其所容。適逢西夏擾亂邊境，他上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結果遭到劉瑾忌恨，遂與何瑋（粹夫）一起引退，在官僅兩年。這是他人生第一次起落。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呂枏於劉瑾伏誅後，官復原職，時年三十六歲。然不久又遇乾清宮火災，他應詔上書呈六事，又多次上書直諫，皆不被採納，於是便再次引疾而歸。這是他仕途的第二次起落。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世宗即位，呂枏再次被起用，不久卻因「大禮議」之爭而觸犯龍顏，與鄒守益（東廓）一起被處入獄。這是他仕途的第三次起落，在京爲官亦僅兩年，後被貶爲解州判官。然呂枏仍積極參與時政，不與閹宦妥協。其任地方官時，他廣開教化，曾興建解梁書院，人贊其「興學而人才丕變，勵俗而禮讓大行」（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三七馬汝驥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公枏行狀）。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呂枏轉爲南都吏部考功郎中，自此以後，他才逐漸走出仕途的陰霾，先後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尚寶司卿，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累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等，在南都共計九年。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上疏請歸，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病逝。一生爲官，剛正不阿，兩袖清風，深受人們愛戴。史載呂枏「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明史卷二八二呂枏傳）

與宦海多舛、仕途低迷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呂枏爲學卻日漸精進，影響甚大。他在第一次引退之後，即在家鄉營造了東郭別墅，每日聚徒講學其間，四方學者慕名雲集而來者衆。後因別墅不能容納，旋即又築東林書屋，講學的規模和影響愈來愈大，史稱「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明儒學案師說）。在貶解州判

官期間，其爲政之餘常在解梁書院講學，今本涇野子內篇中的端溪問答、解梁書院語等即爲這一時期講學的記錄。在南京任職的九年中，呂柟與當時天下著名的學者進行了廣泛而頻繁的學術交往和論辯，其涇野子內篇中的柳灣精舍語、驚峰東所語即是這一時期講學的記錄。在致仕回歸後至逝世的四年中，他仍孜孜講學於北泉精舍等。明史稱其「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明史卷二八二呂柟傳），顯然他是明代陽明流行時堅守程朱立場的代表學人之一。

呂柟早年問學于渭南薛敬之，始得周、程、張、朱之理學正傳。薛敬之之受業於秦州周蕙（號小泉），而周蕙又曾聽學於蘭州段堅，段堅私淑薛瑄，並直接受學於薛瑄門人閻禹錫。故明史呂柟傳稱：「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曰：「柟之學出薛敬之，敬之之學出於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卷一七六）故黃宗羲將呂柟列入河東學案中。雖然呂柟之學出自河東，但薛瑄之學對他的影響亦隨著時代的推移和思想的發展在逐漸減弱，黃宗羲說：「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河東學案下，明儒學案卷八）。儘管呂柟在學問上宗程朱，但他卻不偏執，一面對朱子學仍有修正，一面對其他諸家特別是陽明心學持寬容的態度。如世宗即位後，呂柟官復原職。當時王陽明講學東南，當權者推崇程朱之學，主考官對陽明之學又深爲嫉恨，竟有焚書禁學之議，呂柟卻不因其與陽明學術有異而排斥之，反而對其「力辨而扶救之」，終於使某些人的禁學之議未能實施。時考試場中有一士子在對策時，提出要將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雖然他的策問甚合所問之目的意旨，其他經、論、表所答也可以，同事欲錄取他，呂柟認爲「此人今日迎合上司，他日必迎合權勢」（關學編卷四），遂不贊成錄用。這既反映了呂柟不因學派之異而排他的寬容心胸，也反映了呂柟爲人的一身正氣。